

中国改革开放史

主讲人：江满情

第一讲 拨乱反正

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一）华国锋的巅峰之路

华国锋：本姓苏，名铸。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1938年，华国锋参加抗日游击队，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夕，新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华国锋随军南下，1949年8月，任湖南省湘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

1952年调任毛泽东家乡湘潭县委书记。1954年，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这一年华国锋33岁。年轻有为。毛泽东第一次记住华国锋的名字是他在任湘潭地委书记一年后的1955年夏。

1955年7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华国锋写出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固依靠贫农》等三篇在指导思想上符合毛泽东意向的文章。这些带有乡土气息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并记下了华国锋的这个名字。

1955年秋天，毛泽东回到湖南省视察，在长沙第一次接见了担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蓄着平头、穿着朴素而神情激动、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老实厚道、忠诚可信的印象。

农业学大寨期间，华国锋将湖南岳阳县毛田区搞成仅次于大寨的农业典型。1964年7月1日，由于华国锋的努力，陶铸的首肯，韶山毛泽东陈列馆破土动工了。他调动全省一切力量来支援这项工程，10月1日，韶山毛泽东陈列馆落成开馆。从动工到落成，仅用100天。

华国锋并搜集到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的照片，亲自送到北京，请毛泽东过目。1965年，华国锋担任工程总指挥，为毛泽东的故乡湘潭，修建干渠长达240公里的韶山灌区工程，华国锋调集10万民工，发挥冲天干劲，引涟水灌溉一百多万亩农田，新造农田6800亩。这一壮举，是他之前几任省委书记均想做而未到的。

华国锋在“文革”开始后受到冲击，毛泽东对其力保。1967年6月，毛泽东对湖南军区负责人说：“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华国锋，他就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周恩来向湖南打电话要华国锋进京，因此本已被关押起来的华国锋被毛泽东和周恩来“捞”到中央。

1969年4月，华国锋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一个明显的上升的信号，1970年12月，华国锋任省委第一书记。

华国锋在湖南工作的经历，以及与毛泽东的数次接触，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华国

锋对毛泽东的忠诚和尊敬，也颇得毛泽东的欢心。而且最重要的是，从地方来的年轻干部华国锋一无靠山，二无帮派，为人忠厚，态度谦和。被提拔到中央后，华国锋有了更多与毛泽东接触的机会。他的忠厚可靠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宽心。

1971年“九一三事件”成为华国锋迈入领导层的重要节点。9月底，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增补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1972年2月，华国锋兼任公安部部长一职。此后，华国锋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要助手。

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华国锋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1976年，毛泽东因对王洪文感到失望，变为“厚重少文”的华国锋值得信任，于4月7日提名华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中国政治走向到了重要关头。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能容忍翻案，然而“四人帮”早已成为众矢之的，况且也不能成器。华国锋在中央没有复杂的关系，而且有切实的工作经验，这比起靠造反起家的“四人帮”更让毛泽东看中，为人老实厚道，与两派都能保持团结。

更重要的是，华国锋能够坚定地遵守毛泽东的指示和路线方针，毛泽东决定让华国锋代理总理职务。“邓小平要让一让，王洪文、张春桥也要让一让，让华国锋来主持”。华国锋在动乱的政局中一步步走向中国政治的核心。

毛泽东逝世不满一个月，华国锋即与叶剑英、汪东兴联手将“四人帮”强制隔离。华国锋对毛泽东的忠诚和尊敬伴随其大半生，在处理江青问题上，他曾说道：“他（毛）想到江青会闹事，以后会有人除掉江青的。但是他自己没有做这件事。如果他像铁托一样生前处理好夫人的问题，他的威望就更高了。”

1976年10月，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华国锋有功在身，又加之得到叶剑英等老帅的支持，很自然地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推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叶剑英：“华主席谦虚、稳重、诚恳，有民主作风，是领袖之才。毛主席是慧眼识英雄。华受命于危难之机、非常之时，非常之事非常之人，建立非常之功，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旁人眼中的华国锋；工作认真细致踏实；胆小怯弱

（二）邓小平的三起三落

邓小平，1904年生，四川广安人。16岁去法国，勤工俭学5年，后又赴苏一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培训。1927年回国后不久，就回到周恩来手下，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邓小平不但参与了筹划城市暴动的工作，而且年仅25岁的他还被派往广西领导城市暴动。

邓小平长期居于中共权力的中心当毛泽东开始在江西建立根据地时，邓小平也去那里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在长征期间，邓小平参加了关键性的遵义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为领导人脱颖而出。在延安时期，邓小平担任了领导部队政治工作的政委。

1947年，邓小平率领冀鲁豫野战军（即刘邓大军）主力12万余人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统治区心脏，在中国革命解放战争史上创造了一个军事奇迹。此举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1956年以后，他与其他5位国家最高官员一起参加政治局常委。

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共同之处：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毛泽东说：邓小平武可以比林彪、彭德怀，文可比周恩来和刘少奇。

1932年第一落、蹲点；1935年遵义会议前，第一起；1967年第二落，1969年到江西当
钳工；1972年底第二起；1976年第三落，软禁；1977年7月，第三起

（三）邓小平的第三起与“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

叶剑英军委副主席 1976 年 10 月，叶剑英提出为邓小平复职；华国锋拒绝 1976 年 10 月华
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方针；叶剑英与华国锋分歧 1977 年初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叶剑英与华国
锋谈话，华国锋让步 1977 年 7 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复职

（四）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 年 5 月——1978 年 12 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全国大讨论《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胡福明的写作经过

罗瑞卿支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1978 年 11 月至 12 月，中央工作会议 1979 年 1 月 18 日 1979 年 4 月，理论工作务虚会
议 1979 年 7 月以后“补课”

（五）华国锋下台

（六）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二、科学评价毛泽东

（一）平反冤假错案

- 1、华国锋平反冤假错案及其局限
- 2、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与平反冤假错案的初步开展
-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二）思想混乱

（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

- 1、叶剑英建国三十周年讲话
- 2、解决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错误的突破
- 3、接受法拉奇采访，向世界宣布将科学评价毛泽东
- 4、四千人大讨论——邓小平提出：对有些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不能接受
- 5、陈云建议：专门加写一回顾建国以前 28 年的历史的段落
- 6、决定在建党六十周年时拿出定稿

（四）毛泽东评价斯大林与邓小平评价毛泽东

（五）科学评价毛泽东的意义

《诉衷情》

当年忠贞为国筹，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第二讲 乡镇企业的崛起

一、乡镇企业产生的原因

- 1、社队企业
- 2、拿起“榔头”对付“剪刀”

二、乡镇企业的艰苦生长

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四、乡镇企业的几种模式

苏南模式

1、“苏南模式”的特征

苏南：苏州、无锡、常州三市所辖 12 个县市

苏南模式：三为主、两协调、一共同

三为主：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集体经济为主；在产业结构上，以乡镇工业为主；在经济运行机制上，以市场调节为主。

“两协调”：实现地区性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一共同”：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和原则，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走逐步实现社区内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2、“苏南模式”形成的历史条件

- (1) 计划经济时期，以集体经济发展乡镇企业的传统
- (2) 经济地理环境
- (3) 人文环境

3、传统“苏南模式”的衰退

表现：

原因：(1) 集体所有制先天不足
(2) 引进外资注重数量忽视质量
(3) 新的“平均主义”
(4) 新的腐败

4、苏南乡镇企业的改制

- (1) 中小型企业：出售为主
- (2) 中型企业：以实行股份合作制为主
- (3) 大型企业 大而盈的企业：公司制改造 大而亏的企业：整体置换；分块启动；关停搬迁

温州模式

1、“温州模式”地带及特征：温州市所辖各县滨海地带；以家庭工业为主，以个体经济为主，

以日用小商品生产为主

2、形成原因(与苏南的比较):

- (1) 经济基础状况: 苏南较富; 温州贫困
- (2) 经济地理: 苏南, 临近上海等大中城市; 温州, 距离大城市较远
- (3) 交通: 苏南便利; 温州交通不便
- (4) 耕地: 温州人均耕地不及苏南的一半

3、“温州模式”成功的原因

- (1) 市场经济模式
- (2) 发展民营经济
- (3) 从无序到有序

4、温州炒团资本

炒房团

炒车团

炒煤团

5、“温州模式”的困境及其出路

- (1) 产业结构: 以低端产品为主的轻工业一直占据优势
- (2) 外向型经济与资本外流
- (3) 人格化交易问题: “封闭式交易”、“血缘原则的交易”、“人情交易”
- (4) 温州经济速度放慢的主要原因

珠江模式: 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 发展外向型经济, “三来一补”企业占重要地位

1、形成原因:

战后国际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

我国的改革开放

经济地理: 毗邻港澳

2、“珠江模式”内容的变化

企业性质向独资企业发展

“三来一补”企业改为合资企业

直接引进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企业

3、产业结构的转型带来的新机遇

农村地区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基地和加工区

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配套服务

五、农村城市化道路

1、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 (香港、韩国、新加坡)

2、农村工业分散化 (台湾省、印度)

第三讲 中美建交

一、文革初期中国输出革命与国际关系的空前紧张

文革初期中国外交的政策：输出革命

1966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受文革的影响，中国这时一切对外工作都被视同为国与国之间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工作，一度完全被对外宣传中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鼓吹和煽动世界革命的方针所取代。

外交部部长陈毅也公开告诫外交官们说：“中国革命胜利了，还要世界革命胜利，还有成千上万阶级弟兄受苦受难，我们还有国际主义的义务，还要把我们的力量百倍地加强，还有敌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美帝国主义对我们进攻。”搞好使领工作，就是要“扩大主席思想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推动世界革命”。

毛泽东也公开号召：“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

1968年毛泽东对列宁预言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期待及其困惑

1969年，珍宝岛事件与中美接触

二、中美各自调整外交战略

（一）毛泽东改善中美关系的举措

1970年请斯诺夫妇上天安门

1971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二）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尼克松

当选总统之前的反共立场

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缓和中美两国关系的举措

尼克松政府的外交战略：维持世界对比力量的均衡

（三）《上海联合公报》

台湾问题

两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立场

扩大科学、技术、文化交流及贸易往来

三、“联美制苏”的设想及其挫折

对美和解对中国外交关系所带来的收获

毛泽东设想“联美制苏”，即“一条线”“一大片”政策

对毛泽东而言，“联美制苏”仍是一种谋求“各个击破”的策略

美苏缓和与毛泽东的失望

随着美国从越南战争中撤出，中国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下降

美国的优越感让毛泽东受辱

四、三个世界观点的提出

1946年8月，毛泽东提醒人们注意二战后冷战对立的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

1956年，毛泽东进一步发展其“中间地带观”

1963年9月28日明确提出：中间地带有两个

1964年1月17日，提出“第三世界”的概念

“联美制苏”设想的挫折使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第一次完整的表述“三个世界”的理论

五、中美建交

1974年，福特总统继任总统，提出要在台湾设立“联络处”，并希望中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

邓小平提出断交、废约、撤军，台湾问题由中国自己解决

1975年福特访华，提出美国减少驻台军队，仿照“日本方式”，但建交的必须条件是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邓小平重申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及台湾问题为中内政，但同意按照“日本方式”解决问题

1977年卡特政府就任美国总统、美苏关系紧张8月，万斯“探索性访问”，要求不发表反对美国政府声明的声明，不要强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再次强调中国人自己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

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表示美国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但“希望”（而非作为条件）在美方作出期待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

1978年7月，中美建交谈判拉开帷幕 1978年12月6日发表《中美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五）中美关系的折冲与合作

美国《与台湾关系法》

《八·一七公报》

1988年布什总统上任

1989风波中美缓和

（六）小布什上台后

中美关系的危机及其缓和

2001年小布什上台

2001年9·11事件及中国的反应

（七）奥巴马政府

“巧实力”外交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1、对中美关系新的定位，界定为“共同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关系”

2、中美关系进入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阶段，短期内以合作为主。

3、2016年5月23—26日，奥巴马访问越南，宣布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华盛顿已经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反华防御联盟的领头羊，其成员包括日本、韩国、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越南是奥巴马建立的这一遏制体系的核心。颜色革命 (Colorrevolution)，又称花朵革命，是指20世纪末期开始的一系列发生在中亚、东欧独联体国家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政权变更运动，而且这些运动有向包括中东的一些地区在内的地方蔓延的趋势。目前颜色革命已经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几个国家取得成功，推翻了原来的政权，建立了新的政府。

美国也想借此机会，试图对中国进行西化与分化，并且在地缘政治的基础上完成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包围，对当今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动“颜色革命”，企图使中国陷入社会秩序混乱的境况。

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往他国的“深度睡眠者”：这些人是与中央情报局建立某种关系的个人，但他们的基本任务是长期生活在国外并有所成就，以便充分了解该国的文化、人民和政府。中央情报局承诺将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帮助他们成就事业，但当中央情报局发出任务召唤时——十分隐秘且有可能十年内仅会有一两次——他们将坦诚地详述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美国派往（或是务色）中国的一位“深度睡眠者”，个人的成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他亲眼目睹了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到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时期市场经济驱动的社会变革。“事实上他与许多中国领导人建立了重要的工作关系”。（艾利森《注定一战 P16》）

第四讲 中日关系的新发展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

1、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周恩来总理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

1952年，签署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2、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

1957年，岸信介上台及中日关系的中挫

1958年，中国政府提出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围棋外交”

3、“中日贸易三原则”及半官方关系的建立

1960年，“中日贸易三原则”1962年，LT备忘录贸易

1964年，双方互设半官方办事机构，互派常驻记者

4、《中日联合声明》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这对中日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朝野各界人士纷纷谴责佐藤政府的错误对华政策，要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美国在同中国进行秘密外交活动的时候，并没有给他的亚洲盟友——日本透露一丝一毫的消息。7月16日，在中美公告发表的前三分钟，美国将这一消息通知了日本政府。日本朝野一片哗然，舆论惊呼这是“越顶外交”。

1972年6月，佐藤荣作被迫下野。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应运而起，成为日本新首相。

“迷惑”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访问北京，当天晚上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欢迎宴会上，田中发表祝酒词，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过去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迷惑，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周恩来于9月26日，对田中在25日欢迎宴会上的发言，进行了如下的纠正和批评：田中首相在昨天晚宴上的讲话中有“添了麻烦”一词，这个词只是在不小心把水溅到路边妇女的裙子而表示道歉时才会使用的，可是你们却在提及中日两国不幸的过去时使用了。

田中“迷惑”这个词也是从中国传来的。但是日语的“迷惑”不同于汉语的“迷惑”的意思。我们日本人是有自己的习惯的。当过去的事统统付之东流，而以非常强烈的感情来处理问题时，就常采用这个词汇。

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就当时国际形势而言，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正日趋松动，而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野心与势头，却有增无减，因此，反对霸权主义，消除对和平、安全的威胁，就成为我国对外战略的核心与国策。

1974年9月，我国以乔冠华外长名义，正式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尽早开始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

1974年12月就在中日缔约谈判即将开始之际，田中被迫下台，继任的三木武夫首相，虽然对中日缔约表示积极，但对苏更为慎重，在自民党内反对派和苏强大压力下退缩不前。

日本方面虽然对缔约谈判作出了积极响应，但内心比较复杂，尤其不愿因两国缔约而涉及和得罪苏联，所谓“日中是日中，日苏是日苏”，是他们的口头禅，早在中日复交之时，田中即派大平外相前往苏联，解释日中建交，不针对第三国。田中很希望利用中日复交的有利地位和技术优势，打开日苏关系僵局，推动归还北方四岛，但被苏所拒。

1975年新年开始，中日缔约预备性谈判正式开始，起初，会谈尚属顺利。

“总论”之后进入“个论”，分歧逐渐显露。特别是对照双方条约草案案文，对于是否将反霸条款写进条约，成为双方最大分歧。

我方原以为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已包含“双方不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的内容，据此，将反霸写入条约应当不成问题，但日方从一开始就想方设法回避，不愿有任何涉及、影射第三国的内容写进中日两国的条约，日本虽承认面临的现实威胁，但只承认泛泛而论的霸权、强权，担心和不愿因具体提及反霸，被摆在“敌视别国”的位置上。

日本方面之所以这样，关键在于苏联方面的干涉。但中国方面，坚持反霸的条款。

1975年9月下旬,宫泽外相和乔冠华外长出席联大会议期间在纽约会晤,宫泽抛出了所谓“反霸四原则”即:反霸不针对第三国;不得与联合国宪章相矛盾;不意味采取联合行动;范围不限于亚太而在全世界。

对此,乔冠华外长表态说:“如果日方有困难,不必勉强,没有条约,我们也相处得很好,天也塌不下来”。至此,中日缔约谈判,由于在反霸问题上的分歧而实际上宣告中断。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我国对外政策也在酝酿逐步进行重大调整,既服务于消除现实威胁、反对霸权主义的战略,又有利于为实现现代化创造和平稳定国际环境这一战略目标,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无疑符合我战略全局利益。

此时美国卡特政府推行“联华制苏”战略,正在为美中建交采取行动,这对日本接受反霸条款也有推动。卡特在福田访美时,规劝日本应积极行动。

1978年7月,中断两年多的中日缔约谈判重新在北京开始。双方代表团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先后举行了14次事务性谈判”所涉及的焦点仍是反霸原则及与此有关的第三国条款。

日方决定园田外相到北京进行外长级谈判。对于外长级谈判,外务省准备了A、B、C、D四个方案。

其中,A案的基本精神是:“根据本条约发展日中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不是针对任何第三国”。B案的基本精神是:“在同第三国的关系方面,本条约并不损害各缔约国的立场。”C案的基本精神是:“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的同时,还要写入‘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这就是所谓高岛条约的内容,也称高岛方案)。D案的基本精神是:“条约写入反霸条款,同时还写进‘两缔约国无意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意图。’”最后确定为C案和D案,外务省认为最理想的是中国方面接受高岛方案,即C案。

1978年8月12日两国外长分别代表政府正式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不久,我国人大常委会和日本众参两院各自批准了这一条约。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问日本,中日双方互换了条约批准书,为长达4年的谈判和缔约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三、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

四、钓鱼岛争端

五、日本右翼势力的复活

日本右翼势力自孽生迄今,已经历战前战后两个“六十年”它不仅在战前“六十年”给本国和东亚邻国造成了亘古未有的战争灾难,而且在战后“六十年”还一直在恶化着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外交关系,时至今日,它再次对日本的未来走向和东亚和平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对此,不仅日本有识之士深表忧虑,而且也使东亚邻国尤其是中国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警觉。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周恩来不仅敏锐指出日本政客对台湾“大多有野心”,而且提醒国人做好与日本右翼长期斗争的准备;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邓小平不仅敏锐指出“战后日本一部分人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想要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而且提醒国人这些人“为数不多,能量不小”,十分“值得警惕”。

六、改革开放时期和平与发展外交战略

1980年2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上述思想。他指出，“我国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1985年3月，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时代主题思想：“现在世界上真正正在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在这个国际格局下，中国是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赶上经济发达国家的艰巨任务。中国的国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同时又加强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在“东西南北”的格局中，中国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为谋求世界和平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随着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的日益明确，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在理论上和执行中都有重要的新内容的充实。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确立不结盟原则。邓小平指出：“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

第二，反对霸权，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邓小平说：我们“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

第三，国家利益原则。国与国的关系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好恶，只有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和处理国际问题，才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增进国际合作，维护实践和平。

第四、对外开放原则。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同各国的经济、贸易、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面向全世界的，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开放。

第五，在对外政策实践中，采取“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邓小平强调，对形势的分析判断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在急剧变化的国际局势之下，中国要稳住阵脚，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二是要真正地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搞下去。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战略的主题观念是经济建设、国家富强和开放参与。在国际关系价值取向上逐步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最终取向于为经济建设服务，谋求集中体现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国家利益，最终确立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正是在这一外交战略的指导下，中国的对外关系得到新的发展。

（三）对外关系的新发展

1、中国同西欧的关系。80年代开始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和西欧的双边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迅速的发展。

1995年，欧盟15国同中国的贸易额首次突破400亿美元大关，1997年达430亿美元，1998年增至488.6亿美元。这一时期，经济利益成为推动中欧关系的根本动力，中欧双方

均从战略高度出发，重视加强同对方的关系。

2、中苏关系的新阶段

中苏关系由 70 年代延续下来，在 80 年代初仍处于对立状态。但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中国对外政策包括对苏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中苏关系也由对立逐渐松动、缓解并恢复正常。

3、中与俄睦邻关系的建立

在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建立之初，中俄两国关系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休克状态。双方对突然间要面对的一切都感到茫然失措 1992 年 12 月 17、18 日，俄罗斯联邦总统鲍·尼·叶利钦总统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访问期间，杨尚昆主席和叶利钦总统签署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的签署，标志着中俄两国新型国家关系的确立。这种新型国家关系的基本特点“两国关系既不是对抗的，也不是结盟的，而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

总之，80 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显示出更活跃的特点，采取多元化的无敌国外交、独立自主外交、和平外交、经济外交和务实外交政策，收到了良好的、现实的效果。

第五讲 国有企业改革

一、改革前的国营企业简况

- (一) 新中国国营经济的建立
- (二) 新中国国营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

- 1、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
- 2、“大跃进”时期
- 3、1961-1966 年
- 4、“文革”期间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过程

- (一) 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9-1984 年)
 - 1、1979—1980 年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 2、1981 年—1982 年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
 - 3、1983 年以后实行利改税
- (二) “两权分离”阶段 (1985-1992)
 - 1、对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承包制
 - 2、对国有小型工业企业实行租赁制
 - 3、推行股份制企业试点

(三)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994-2003)

三、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资产流失问题

四、世界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

(一) 法国

1、混合型市场经济体制

2、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体系

议会监督

政府控制

法院稽核

3、法国管理国有企业主要特点

分类管理：垄断性和竞争性

合同管理：计划合同制；社会组织

4、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的亏损 股份制：循序渐进；开放资本；职工股东制

(二) 英国

1、国有企业效益差的原因：政企不分；垄断地位；机关式管理

2、股份制改造：股票上市和国有股权出售

3、改造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式

富余人员：鼓励提前退休、辞职；强制裁员；增加就业

关系国计民生的国营企业民营化后的大政方针把握：特别股

4、改革效果

(三) 德国

三个阶段

1、企业民营化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

2、对原民主德国（东德）的国有企业进行托管改造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

企业再造段（90年代以来）

(四) 俄罗斯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重新构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私有者阶层；打破国家垄断；提高生产效率。

阶段：

1、“小私有化”阶段

2、“大私有化”阶段

3、“大众私有化”阶段

4、“现金私有化”阶段

改革中的主要问题

1、改制的速度和强度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

2、只注重所有制的改革，忽略提高经营效益

3、以发行私化证券的方式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对宏观经济产生损害

原因 1、思路偏激 2、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

（五）越南

目标：1993年，越南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定向的、国家管理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市场经济”

内涵：1、放弃前苏联式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2、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其他经济成份用为补充 3、以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为理论基础

改革方法及途径：

1、市场化：破除“包给制”，建立新型市场经营机制

2、公司化：建立各种形式的总公司

3、股份化：国有企业吸收居民和非国有企业投资，使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融合

第六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一、改革前的思想成果

人们的共识：计划经济的实际运转远不像理论上讲的那么好，需要改革

顾准：提出实行市场经济，让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去调节生产（被打成极右派）

陈云：“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又称“三为主，三为辅”）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以计划生产为主体，在国家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充（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受到批判）

孙冶方：在国家计划的范围内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激励企业改善经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二、1978—1983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78年7至9月，国务院务虚会议，许多经济学家提出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

孙冶方（此时已平反）：“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

副总理李先念作总结：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1979年2月，李先念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增量改革”:占主体地位的国有经济大体保持原有的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在国有经济之外开辟市场经济作补充 增量改革积极与消极方面:震动小,滋生腐败

争议:1982年8月十二大报告的起草:提出绝对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

1982-1983年批判,《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薛暮桥,刘国光等人受到批判。

十二大政治报告重提“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

国有企业改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

三、1984—1991年,建立起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1-1984年,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受到压制,国有部门的改革迟滞,非国有部门则充满活力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议的起草:马洪受命组文为商品经济翻案,决议的表述对于反对力量的妥协:保留“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提法,在“商品经济”前加上了“有计划”的限定词,规定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企业和资源都不是商品。

同年,《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国有企业改革:“两权分离”阶段(1985-1992)

四、1992—,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新的大论战:89年国内的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

有人将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同姓“社”姓“资”相联系

中央高层的分歧: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1989年5月31日,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

江泽民则有所倒退:1989年9月29日,改变了十三大“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提出“在总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

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邀集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与对策,争论激烈:持“计划取向”的人强调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主张“市场取向”的批评这种口号是倒退应恢复十三大的提法

1990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七中全会,李鹏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适应要求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1991年3月,皇甫平,《解放日报》,《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受到围攻与批判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最终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长达十多年的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论争基本上宣告结束,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终于得到确立

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

具体而言:经济形式;市场体系;政府职能;分配方式;社会保障制度

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组织,标志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型

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4-2003)

第七讲 恢复高考

一、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

1、革命时期中共党对教育的实践

2、民国时期的高校招生

二、改革开放前的高考

1、过渡时期的高校招生:单独招生和联合招生(1949-1951)

2、建立统一招生制度(1952年)

1952年6月12日《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

1958年,统一高考受到破坏

1959年再次恢复全国统一高考

3、文革中高考制度被废止

1960年停止免试保送工农及工农干部 1962年取消对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复转军人等优先录取 1962年工农家庭出身的新生比例 1964年,毛泽东批评学校考试 1966年,“五·七”指示、《五·一六通知》、《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6月13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970年“七二·一”指示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经要》:“两个估计”;高校招“16字方针” 1972年大部分高校恢复招生:工农兵大学 毛泽东的农民情结与工农兵大学 冯友兰认为毛泽东“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

三、恢复高考

1977年6月—7月15日,文革后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图片 邓小平提出要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

8月13日,1977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

1977年底,全国570万青年参加高校招生考试图片

1980年全面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

四、改革开放中的高等教育

(一)第一阶段,拨乱反正,确立教育现代化的任务(1977-1985)

培养“四有人才”

教育面“三个面向”

随着恢复高考制度,恢复重点学校制度等等,教育的恢复和重建基本上重新回到 20 世纪 50 年代

(二)第二阶段,全面开展教育体制改革(1985-1989 年)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

89 风波后,教育发展低迷

(三)第三阶段:“教育产业化”和“教育大跃进”(1990-2003)

1992 年,《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将教育定义为第三产业。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1999 年高等教育大扩招

(四)第四阶段: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教育公共政策(2003 年以来)

2007 年,免费师范教育

2010 年《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建设国际一流大学

五、钱学森的世纪之问

“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大学的崛起即大国的崛起

中国大学的成就与局限

诺贝尔奖华人得主

李政道:1926 年生于上海,美籍华人,1957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 31 岁;(获奖时为中华民国国籍,持中华民国护照,但旅居美国,1960 年代加入美国籍。)

杨振宁:1922 年生于安徽,美籍华人,1957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 35 岁;(获奖时为中华民国国籍,持中华民国护照,但旅居美国,1960 年代加入美国籍。)

丁肇中:1936 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1976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 40 岁 李远哲:1936 年生于台湾,美籍华人,1986 年诺贝尔获化学奖,时年 50 (现已放弃美国籍,回到台湾)

朱棣文:1948 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1997 年诺贝尔获物理学奖,时年 49 崔琦:1939 年生于河南,美籍华人,1998 年诺贝尔获物理学奖,时年 59

高行健:1948 年生于江西,获奖的同年加入法国籍,2000 年诺贝尔获文学奖,时年 52 岁。

2012 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有史以来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2015 年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类科学奖的科学家——屠呦呦，中国本土科学家，生理医学家。

1989，鼓吹西藏独立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获诺贝尔和平奖

刘晓波：1955 年出生，早年当过知青和工人，1984 年硕士毕业后留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四年后，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在香港《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些对中国在什么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的问题看法，其中他说：“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并扬言“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 I 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肖子孙，且以此为荣。”。2010 年因反华势力支持获诺贝尔和平奖，时年 55 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